

榮陽縣志

概 述

地 理

第三冊

(征求意见稿)

1985·12·

荥阳为我国历史名城，《禹贡》“荥阨既潏”，即济水自温潜行入河，南溢为荥，聚集为泽，古称荥泽。战国时韩在荥水之北筑城，名曰荥阳。（故城在今郑州市郊区古荥镇南）西汉置县，北魏孝文帝时，荥阳县治自故城迁至大索城，即今荥阳县老城。

1954年6月，荥阳、成皋两县合并，名为荥阳县，县政府设在荥阳县城，1981年迁入新城。今之荥阳县即包括历史上的荥阳、京、成皋、制、武泰、汜水、河阴、虎牢等几个县所辖地方。

荥阳位于河南省中部，中州文化发祥地——黄河之滨，东临省会郑州，西踞虎牢雄关，南依伏牛余脉，北濒滚滚黄河。地理座标在北纬 $34^{\circ}36'$ 至 $34^{\circ}39'$ 与东经 $113^{\circ}7'$ 至 $113^{\circ}30'$ 之间。县内南半部及西、北边境，均为岗峦起伏，沟壑纵横的浅山区，土地瘠薄，十年九旱；中部、东部为平原，宜于耕种，建国后，水渠如网，机井棋布，尚能稍抗旱魃威胁，保证粮棉收成。

全县分十五个乡镇，共294个村民委员会。1490个自然村。据1982年统计，共有110,564户，540,123口人，其中农业人口517,751人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66人。

县内南北最长处45.5公里，东西最宽处37.6公里，总面积为954.8平方公里，折合148.3万亩，实有耕地面积80.6

万亩，其中水浇地38.5万亩，机耕地42.8万亩。全县均属农业种植区，间以林木、水果。农作物以小麦、玉米、谷子、豆类、红薯为主，近年来推广种植旱稻。水果以县南部、西部的柿子，北部的石榴，驰名全国，柿霜糖更见珍贵是馈赠佳品。地下矿藏有煤、褐土、铝、硫铁、石灰石、白铁、磷矾土，大理石等，也有少量的金和石油。

荥阳地势，南，西，北三面为山区，中部、东部地势平坦，南有塔山、万山、三山、双峰山、五云山等，西有方山、马头山、大伾山等，北有广武山，塔山上有北宋建的千尺塔（曹皇后塔），大伾山上有虎牢关，成皋故城，广武山上有秦王（李世民）寨，楚汉相争时的汉霸二王城。均为名胜古迹。

河流，北有黄河，中有索河，汜河，洧河，南部山区，溪流多处。汜河、索河及郑郊的须水河，京水河均发原于此。只以近年来水位下降多数河流枯涸。

历代至今，荥阳的沿革和发展变化可分四个时期：

一、从氏族公社到封建社会初期的夏、商、周，荥阳从分散的先民村落，逐步形成居民聚邑。从考古发现，荥阳有五十万年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五、六千年前的原始村落遗址。后为炎帝之墟，商帝仲丁迁都于敖，周穆王畜虎于东虞，后称虎牢。郑文公封于郑，拥有虎牢以东之地。列国争夺中原，在荥阳发生过郑、燕虎牢之战和晋楚郟之战等战争。

二、封建社会中期，秦、汉至隋、唐，荥阳为政治经济枢要，征战频繁时期。秦、汉以后，封建制度从巩固到发展，阶级斗争更为激烈。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36年的1157年间，历十八个朝代，兴替相仍，其国都多建在咸阳、长安、洛阳等地，荥阳、虎牢，南连群山，北临黄河，东接平原，西通洛阳，成为长安、洛阳的东方门户和锁钥，皇帝为巩固其统治，必固守虎牢以卫京师，东方藩镇图谋篡国，必攻下虎牢以夺取都城。所以虎牢之得失，每系一代之兴亡。因此，历代统治者均视荥阳、虎牢为重地，派要员坐镇，重兵把守。自秦在敖地设仓后，历代均在此储江南、关东之粮，以输京都。曹魏西晋、十六国、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、唐、皆置荥阳郡，广武郡，成皋郡，郡治设在荥阳、成皋等地；北魏、东魏置北豫州于虎牢，刘宋置司州于成皋，北周、置荥州于成皋，唐置郑州于武牢。足证其为行政要区。军事上在荥阳著名的战争有楚、汉荥阳之战，东汉末年诸侯讨伐董卓之战，瓦岗军大海寺之战，李世民、窦建德武牢之战，以及十六国多次争夺武牢之战。其中多次战争，都决定看一朝之兴亡。

这一时期荥阳的经济也很发达。（一）有先进的冶铁业。西汉在故荥阳城西修了一个冶铁业基地，规模巨大，炼铁炉的容量约五十立方米左右，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，大致达到了西方十七世纪的水平。

（二）水运中心。战国时魏在荥阳开凿运河——鸿沟，隋炀帝从洛阳

至黄河经荥口开通济渠，过大梁南至江都（扬州）。唐代又几次开凿荥阳北部的汴水，勾通了黄河、济、汝、淮、泗，北连燕赵，南通江淮，东至临淄，西入关中，成为全国水运中心。是勾通我国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的大动脉。（三）粮储要地。自秦建敖仓以后，历汉、隋、唐皆通过汴水将江南、山东之粮糜储之荥阳，转输关中。故《盐铁论》载：“燕之涿，……韩之荥阳，齐之临淄，富冠海内，皆天下名都”。

文人名士，也代有所出。战国时申不害为法家始祖；东汉服虔，著有《春秋左氏传解》等书传世；晚唐诗人李商隐，在唐诗中别开蹊径；唐代郑虔，精于书、诗、画，世人誉为“郑虔三绝”；历唐之世，荥阳郑氏，代为巨宦，家有“六元八驸马”，世称“郑半朝”。

三、封建社会末期，北宋至民国，荥阳从州郡降为一般县邑。

北宋以后，历代均在开封、南京、北京建都。荥阳、虎牢失去了拱卫京城的重要地位，所以行政上从州郡降为一般县邑，自北宋、至民国，荥阳、汜水、河阴等县均隶属于郑州，唯明代、清乾隆至光绪年间，隶属于开封府。因荥阳仍控东西要道，黄河渡口，故在军事上仍有战略价值，也曾发生几次重要战争，如宋、金时期岳飞与金兀术的竹芦渡之战；明末李自成在荥阳召开了十三家起义军军事会议；太平军在虎牢战胜清军，强渡黄河，进逼北京，至清末、民初，郑州辟为商埠，踞京汉、陇海铁路交会点，北控黄河铁桥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荥阳地处郑州西郊，在军事上自属战略要地，所以直皖之战、直奉之

战、胡憨之战、蒋阎冯中原会战，荥阳均属战场。1941年，日寇渡河南犯，在广武爆发了中日广武之战，日寇盘踞霸王城后，国民党军在荥阳、广武驻扎包围，相峙三年，1944年日寇下山，吞陷荥阳。

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榨剥削，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。特别是日寇盘踞期间，一是中原三年旱、蝗灾害，二是1943年汤恩伯的85军驻荥，扰害滋繁，中原人民称谓“河南四害，水、旱、蝗、汤”。经日寇之蹂躏，水旱之灾害，保甲长之敲诈，军队之勒索，造成荥阳农村凋敝，民不聊生，啼饥号寒，卖儿鬻女，饿殍载道。

这一阶段末期，资本主义有所萌芽，工厂、手工业、商业逐步出现，崔庙开挖煤窑；东史村之桃牌粉笔、曹李之八角徽、京襄城之木鞋，远近驰名。农副产品有荥阳东乡的草帽编、南部之柿饼、冬饼霜糖、河阴之石榴、行销各省、以至东南亚几个国家。原汜水县人多地窄，生活困难，多数人外出谋生，经商者遍及全国各大城市，尤以从事书店文具业的最多。

荥阳文风一向较盛，清末，孙庄（现属郑郊）“一门三进士，父子二翰林”之称，汜水赵东潜为翰林院编修，侍讲学士，精于书法，名盛一时。清末民初，韩凤楼、张鄂翎、马名骥、张济青等十数人东渡，留学日本，回国后皆充军政要职。晚清时，荥阳教育列全国前茅，有“荥阳出教员”的美誉。荥阳武功也很有名，长三宅的拳技，独具

特色。穆沟牛凤山，道光十三年中武状元。

四、新民主主义时期，荥阳从废墟古城，贫瘠苦境中，走上发展的道路。

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。逮至1925年8月中共豫陕区委即派人来荥阳作革命活动，首先在东南部地区搞社会调查，发动农民运动、组织农会，发展党员，建立组织，有68个村组织农民协会，会员13000余人。以后1927年、1928、1936等年上级党均派有党员到荥阳进行革命活动，几年中，荥阳的基层党组织、地下党员遍及全县各个角落，1944年9月，中共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荥阳南部开辟革命抗日根据地，建立荥汜抗日政府、组织革命武装，打击日寇和土匪。1948年5月荥阳解放，汜水、广武合为成皋县；1954年6月荥阳、成皋合并为荥阳县。

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荥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和全国人民一道，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，并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。

（一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，（1949——1956

“有步骤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，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，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。”（引自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以下引文均同此）。

1949年5月，成皋、荥阳先后召开了农民代表会，在各村建立农民协会和村政权，开展减租减息，反匪反霸。1950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。同时，稳定物价，镇压反革命，对旧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有效的改造，全县中小学普遍如期开学，并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。1950年在支援“抗美援朝”战争中，成皋、荥阳发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，共捐献人民币34亿余元（折合新人民币34万余元）。经过一系列的革命运动，基本上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。

荥阳的翻身农民，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但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民、下中农，为了发展生产、兴修水利、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，积极要求走互助合作道路。1951年，荥阳、成皋县委按照中央精神和广大农民要求布署在农村开展“互助合作”运动，发展到1953年末，全县共有临时互助组1076个，常年互助组786个。与此同时，党领导农民逐步向合作化发展，至1951年底，原成皋县即首先建立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6个。至1955年荥阳全县发展初级社615个。由于荥阳县合作化运动的进程较快，被列为全省的重点县之一。从1955年即指引农民向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，至1956年底，全县共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494个，有61,457户参加了合作社，占总农户的98%，通过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，以引导促进个体农业向合

作化的方向发展。

同时，对个体工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。至1956年，全县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。

由于土地改革、互助合作化运动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，使生产关系有了大的变化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，到1956年全县耕地92.8万亩，共产粮食18.188万斤，比1949年增长55.9%，年递增5.7%；平均亩产142.8斤，比1949年增长71.6%，年递增7%；经济作物比1949年增长21.7%。

工商业也有很大的发展。1952年工业总产值457万元，占工农业总产值2,375万元的19.2%，一改荥阳过去没有工业的落后面貌。商业，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，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基本建立和巩固，呈现流通渠道畅通，商品供应充足，经营活跃，物价稳定的局面。此时期也开始建立发电厂，1949年建一小发电厂，只供城内生活用电，1956年改为一个发电机组，并开始供应县城内小型工业用电。

（二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。（1957——1966）

“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，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。直到‘文化大革命’前夕的十年中，我们虽然遭到严重挫折，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”。特别是“农业的

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的展开，并逐步收到成效。”荥阳的各项建设亦在不断的发展，作为农田基本建设的水利事业有其明显的成就，从以打井为主到修建水库，1957年以来，先后修建了河王、庙湾、丁店、三仙庙、谷砦、楚庄、京襄城等水库和李村电灌站。至1966年底全县共建成大小提灌站75处，有效灌溉面积达38,000亩，占耕地面积的3.5%。供电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，1960年开始向农村社镇送电，1963年又在曹李建成35伏变电站，容量可达二万千伏安，全县12个公社，一个镇，64个大队，519个生产队都用上了电，有效的改善人民生活和生产条件。在这几年中，我们的干部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。我们的学校为工业、科技、国防等方面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新生力量，成了各个行业的骨干。

当然，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。荥阳县也随之出现了不少问题。1957年的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，把一批知识分子、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‘右派分子’，造成了不幸的后果。”全县只教师被错划为“右派分子”的就占教师总数的24%，其中大部分是工作能力较强、教学水平较高的骨干分子，把他们开除公职以后，使荥阳教育遭到极大的损失。

1958年，党中央领导人“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”以后，荥阳县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

转眼之间发展为人民公社，开始全县为一个公社，后来按地区分为12个人民公社。强调一大二公，实行一平二调（一拉平，无偿调拨）。但由于人民公社缺乏物资，思想基础，又无经验，就“使得以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。”

高喊“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”三面“红旗”。全民大办钢铁，农民停耕，工人停产，学生停学，全部上山背矿石，粮棉弃于田野，无人收摘。处处建高炉、毁林木，砸锅笼，一切为了“钢铁元帅升帐”。以村为单位，成立大食堂，各户粮食归公，炊具上交。农业上无限制的要求增产，提出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，要农民劳动“放卫星”，日夜不休息，普遍虚报产量，多报则上交，实报则“右倾”，组织批判，造成粮不够交，农民无口粮。要学校“勤工俭学，以劳代学”，教师学生下放劳动。人民普遍食不果腹，积劳成疾，大部患了浮肿病。是非颠倒，浮夸者有功，实事求是者犯罪。农民说：“进食堂，喝稀汤，一天三顿心里慌；红薯饭、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得活。”

商业也受“左倾”影响，对下一平二调，取消集贸，独家经营，盲目采购，积压浪费，供应贫乏，市场萧条。使“我国国民经济……发生严重困难，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”。

1960年冬，中央决定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。”的方针，这是历史的严重时刻的重要转变。对历次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，给被错划为“右派分子”的一大部分人摘掉

了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纠正了“一平二调”，在人民公社中实行“三级核算，队为基础。”公社借给农民一部分土地自主耕种，允许开荒，以弥补几年来因瞎指挥、自然灾害造成的灾荒，使农民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。商业上恢复了国营、集体、集市三个渠道，成为相互促进的流通体系，走上复甦的道路。

但左倾错误的纠正是迫于形势的很不彻底的。生产略有好转，1964年至1965年我县又奉命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（四清），借地、开荒的救民政策，竟又成了“资本主义复辟活动”虽然也解决了一些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，但也使不少好的干部受到批判和不应有的打击。“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重点是整所谓‘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’在意识领域里，也对一些文艺作品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、过火的政治批判，在对知识分子问题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偏差。”

由于荥阳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，即一直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，所以全县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和重大损失，但生产还是持续发展的。

荥阳的工业在这一时期从小到大，有发展有膨胀，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567万元，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.5%。经过1958年的大办钢铁、大跃进，各种工厂纷纷成立，工业总产值提高为2699

万元，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.8%，呈现冒进导致农轻重的比例失调。经过调整，至1962年工业总产值降为804万元，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.8%，基本上纳入正常轨道。

农业在这一阶段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自然灾害，陷于徘徊难进阶段。耕地从1957年的117.9万亩，减少到107.5万亩，总产量停留在15,819万斤左右，只增长1.3%，年递增0.16%。单产由142.8斤增至147.2斤，增长0.97%。

学校教育，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，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至1965年全县拥有初中九个，学生6437人，教师177人；高、完中二个，学生1084人，教师102人；农业中学十处，学生6153人，教师315人；全日制小学村村皆有，共2084班，学生77647人，教师2590人。学生比1948年增长近两倍，十七年中，为高等学校输送一大批新生，为革命输送了部分干部，为农业培养了一代新型农民。

文化事业也普及发展，县和各公社均成立电影放映队，从1956年全县内600个农村俱乐部，到1965年发展为各大队普遍建立，农民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。

（三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（1966——1976）

按照“八字方针”整顿后的荥阳经济，正以健康的步伐向前发展时，1966年5月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

的社讨和“五·一六通知”下达后，荥阳县首先在荥阳高中发起，继之荥阳完中、各初中、政府、企业各单位也风起云涌，整个荥阳上空乌云翻滚，黑风卷浪，形势突然变化，学校内组织红卫兵，社会上掀起造反旗，瞬息间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批斗会夜以继日，当上红卫兵就趾高气扬，鼻空朝天，封为造反派则打砸抢抓，为所欲为，首都传来“炮打司令部”“造反有理”等口号，上海“三月风暴”刮起了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的恶浪，造反派权慾横流，大小单位，公章被夺，党政领导一律靠边。捕风捉影，指鹿为马，罗织种种罪名，将大批老干部、老教师打入“牛棚”，写不完的“认罪书”。红卫兵全国串连，煽风点火，在校内斗老师、砸门窗，毁桌凳，读书者就是“修正主义”苗子；造反派剿家搜掠，焚书籍，燬房舍，兇悍者才显示“革命家”的威风。工人、农民坚持生产，被批为“唯生产力论”，干部、教师坚持工作，被批为“只低头拉车，不抬头看路”；学生坚持学习，被批为“走白专道路”。古人云动辄得咎，今则不动亦难免横祸。江青在北京^自叫“文攻武卫”，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，或~~夤~~夜抄家杀人，或设公堂非法刑讯，美其名曰“三忠于学习班”（忠于毛主席，忠于党中央，忠于无产阶级专政）刑具千奇百怪，穷极残酷。十年来，不知有多少人家无辜坐牢，多少人遭打致残，多少人含冤死去。在岌岌不可终日的险境中，工厂停产，长期亏损，发不下工资；田园荒芜，人民无粮果腹；学校停课，学生多成文盲加流氓。“历史已经明判，‘文

化大革命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灾难和内乱。”

“党和人民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曲折的，是一直没有停止的。”茌阳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到浩劫，人民饱受折磨，但还取得了一定的发展。

在农业上由于绝大部分农民抵制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不误农时地劳动生产。且有建国后的水利条件、电力、科学技术等基础，所以粮食产量仍稳中有升。1966年以后，耕地为95.8万亩，粮食总产量由15,819万斤上升到35,314万斤，增长123.2%，年递增5.5%，单产由147.2斤到368.6斤，增长150.4%。

水利建设也继续进行，至1968年底，全县已拥有电灌水井1308眼，又组织数万民工，耗资数百万元修建了胜利、降龙两条共长21.5公里的水渠，只因开始设计论证不周，水源贫乏，没达到预期效果。电力资源上，这段时期先后建立了李村、四所楼两个变电站，保证县西部西南部用电。

工业方面受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冲击特别严重，搞什么“大批判开路”，矛头指向知识分子、科技人员，原有规章制度一律斥为“管、卡、压”，多劳多得原则斥为“物质刺激”，保证为国家积累斥为“利润挂帅”。从而彻底搞乱了思想，搞乱了秩序，破坏了生产，使

1965年经过调整后的全年利润200.2万元，至1968年下降为116.1万元，下降42%。由于全民工业的停产下马，社队工业乘机发展，但多数因技术、设备条件差，和“大批判”的冲击多有亏损。1976年全县12个厂矿，虽有六户盈利共85万元，但另六户则亏损208万元，总计亏损123万元之多。

商业上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乱精简、乱合并、乱彻除等影响，使商业、供销所属机构大简大并，以致渠道大堵塞，形成独家经营，官商垄断。同时强调“以粮为纲”，导致副业砍光，又取消集市贸易和庙会交流，打击个体经营和小商小贩，动不动就要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造成物资奇缺，供应紧张，市场萧条，民怨甚多，群众生活困难，国家税收减少。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教育上提出搞教育革命，规定学生任务为上、（上学）管、（管理学校）改、（改造学校和教师）教师是被改造和专政的对相，被公开称作“臭老九”。（前八位是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、特、反）根本不可能进行教学活动。领导体制一纸命令变为公社办高中，大队办初中，各村办小学，全不顾校舍、教具、师资等物力人力条件，竞相发展，学校、学生数目立时骤增，1976年全县就有社办高中13个，学生7296人，队办初中215个，学生33，155人，村办小学612个，学生87，637人，全县教师3，465人。数量不少，质量奇差。学生在校不上课，不读书，

只搞斗、批、改，虽曾提出“复课闹革命”，“复课”是招牌，“闹革命”是中心，批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批“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”、批“师道尊严”、“批林批孔”、批“右倾翻案风”，……学校中一片鼎沸。尤其是196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侯振民、王庆余的建议，“教师三下放，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一声霹雳，各级学校一闷而散，教师回到农村后，按出身成份判分，大专毕业生的老教师，基本都受到管制，不能任教，可任教者仅出身贫苦的小知识分子，从而造成教师奇缺，教学质量无从谈起，不少高中毕业生不会小学算术的分数运算，不知道中国历史有几个朝代，不知道中国有几省几市，甚至连一张借条也写不成。相当多的青年，并不感到悲哀，可见青年受害之深。

（四）伟大的历史转折（1976以后）

“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，从危难中挽救了党，挽救了革命，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”荥阳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舒畅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各项工作。在较短的时间内，调整了各级党政文教的领导班子，清除了主要帮派分子，造反新贵，党政领导权又回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手中。学校中开始清除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，逐步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。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的轨道。

“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是建国以来我党历